



11月11日，西泠印社举办建社120周年庆典。120年，西泠印社从无到有，从创立到发展，堪称传奇。西泠印社，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浙派篆刻家丁辅之、王福庵、吴隐、叶为铭等召集同仁发起创建。“人以印集，社以地名”，西泠印社因地邻西湖西泠桥而得名，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目前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艺术团体，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

□周惠斌

在上海图书馆东馆正在展出的《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馆藏汉碑善本展》中，90件汉碑善本精品均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皆属首次集中亮相。其中被誉为“两浙第一碑”的汉《三老碑》，也是西泠印社收藏的第一件价值最大的藏品。

《三老碑》全称《三老讳字忌日记》，刻立于东汉建武年间，是现存最早的东汉石刻之一，也是江南仅见、浙江最古老的碑石。《三老碑》从出土、辨识、递传到最终归宿，命运多舛，际遇起伏，今保存在杭州孤山的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

清咸丰年间，《三老碑》在浙江余姚的客星山出土，碑额断裂，后人根据碑刻内容予以命名。通高90.5厘米、宽45厘米，右侧以栅栏样式自上而下分为4框，各4至6列不等，每列6至9字，镌刻人物谱系，首句“三老讳通，字小父”；左侧为大栅栏，计3列，每列约30字，镌刻铭文和立碑缘由，凡217字。

《三老碑》主要记录东汉建武年间一位名“通”的地方官“三老”(掌管教化的荣誉尊衔，无行政权和俸禄)和妻子、儿子、儿媳、孙子等祖孙三代的名字(讳)及其逝世的日子(忌日)，旨在让后代子孙尊祖敬宗，同时免于言事触忌，不忘春秋祭祀，由第七个孙子“邨”所立，迄今已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

这块碑石当年被余姚村民挖出后，运回家中拟日后留作垒砌墓壁之用，清洗后发现竟是块有字的石碑。近村富绅、“金石癖”周世熊听闻消息后前往辨识，根据其文字内容和字体笔法，判断它非同一般，与村民商议后运至自家庭院，“卜日设祭，移置山馆，建竹亭覆之”，并墨拓了百余份分送各地学者和金石同好研究。

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城略地，兵至余姚，将周置放在竹亭的石碑、汉晋砖石悉数推倒，垒作灶台。太平军退后，“石受熏灼，左侧黧黑，而文字无恙”，周世熊认为“凡物隐显成毁，固有定数。此碑幸免劫灰，先贤遗迹，赖以不坠”，因而格外看重，精心收藏。

1919年，从事古董收藏和交易的镇江人陈渭泉访得《三老碑》，以3000大洋从周氏后人手里购得后辗转运至上海，待价而沽。1921年，日本商人欲以重金收购，浙籍古董商人毛经畴将消息转告任上海知事的绍兴人沈宝昌，沈又告知海宁人、两任上海海关监督官姚煜。他们“不忍古物之沦亡”，为力阻该碑漂洋过海，流失异域，立即通报西

【短史记】

西泠印社集资购藏《三老碑》



泠印社丁辅之。

丁辅之赶赴上海，与社长吴昌硕紧急商议，莫不以为与其“一人守之，不若与众人共守之”，于是广联同乡，吁请协力“酿金(集资)赎之”“大雅宏达，共成斯举”。

浙人闻风响应，名流慷慨解囊，吴昌硕、倪墨耕、何诗孙、陆廉夫、王一亭、商笙伯、高邕之、丁辅之、王福庵、吴石潜、叶为铭等西泠印社同仁各捐献书画印谱10件、古画30件，举行义卖。不到一月，65人共集资11270元，浙江督军卢永祥、湖州首富张钧衡各捐2000元。其中，8000元向陈渭泉赎碑，3270元后用于筑室度藏。

1922年7月，三老碑运至杭州后，“择西湖孤山之阳，西泠印社隙地”，建造“三老石室”，连同社藏北魏、元至明墓志石刻及摹刻宋拓先秦石鼓10枚，一并永久保存。吴昌硕特撰《汉三老石室记》，志述其事，著诗以赞：“三老神碑去复还，长教灵气壮湖山。漫言片石无轻重，点点犹留汉土斑。”石室门墙上另题刻楹联：“竞传炎汉一片石，永共明湖万斯年。”《三老碑》入藏西泠印社，



为印学研究保存了实物依据，成为名符其实的“镇社之宝”，见证了印社先贤大师为保护祖国文物，凝聚社会力量护宝、藏宝、展宝的文化义举，彰显了浙籍有识之士的爱国情怀、民族风骨和崇高品德，更是西泠精神的生动写照。

《三老碑》不同于庙堂巨制、官家刻石，书体介于篆隶之间，由篆入隶，可谓隶成成熟的雏形，在东汉数百通碑刻中，不失为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上乘之作。东汉时期，中原大地刻碑成风，石刻碑铭在黄河流域层出不穷，但在非文化核心区的东南浙地，出土《三老碑》实属罕见，对研究我国古代官制、石刻画谱、书法沿革有重要研究价值。因此一经发现，海内金石家视若鸿宝，名家学者纷纷题跋作记。清李葆恂在《三邕翠墨簪题跋》中评价：“此刻书势屈蟠生动，于诸汉隶中最有笔法可循。”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由篆变隶”“笔法已有汉隶体”。何绍基赞之为“东汉第一碑”，达受(道光年间曾主杭州南屏山净慈寺)誉之为“两浙第一碑”。

□刘旗

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也是海内外成立最早的金石篆刻专业学术团体，西泠印社的影响力是和入社的严格程度成正比的，“诗、书、画、印”是西泠印社人才选拔的标杆，其中，来自山东沂蒙山区的商向前、郭仲选、孙晓泉先生均为南下干部，而且都曾在西泠印社兼任过重要职务。

商向前曾为西泠印社资深理事，郭仲选曾长期担任西泠印社常务副社长，孙晓泉曾长期担任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为印社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商向前(1908—1998)，原名天一，曾用名象乾，笔名老蚕，临沂费县人。早年参加革命，后赴杭州任职。商向前擅书法，懂金石，精鉴赏，学书自颜鲁公、柳公权入手，进而兼学魏碑，尤长于行书，业界评价其书风“浑厚、豪放、纯朴，结体开朗遒劲，含蓄委婉”。

1981年4月，包括商向前在内的28位江浙沪书法家聚集绍兴，在兰亭举行了一次书法盛会。除在兰亭举行开幕式、进行曲水流觞活动和书艺交流外，着重讨论了如何振兴书法艺术，并提议在绍兴成立全国性的书法组织——兰亭书会，希望能与杭州西泠印社一样，成为全国有影响的书画艺术研究与创作的组织。

第二老，是享有“杭州一枝笔”民间美誉的郭仲选先生。郭仲选(1919—2008)，号魁举，临沂兰陵县人。1937年毕业于山东临沂师范学校。“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于1938年参加八路军，戎马生涯整整十载。1949年，郭仲选随军南下，至杭州转业从政，从此定居西子湖畔长达60年。他的行书出于“二王”，于董其昌用功最深，其书纵横驰骋，顿挫从容，晚年更静穆苍厚，人书俱老，形成自家风格，人称“郭体”。1983年，郭仲选任西泠印社副社长，1988年起任常务副社长，尤其在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去世后，继任的赵朴初、启功两位社长都远在北京，郭仲选承担起了社务之责，印社确立每年举行春秋雅集，举行西泠印社篆刻评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书画展赛等海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都是由郭仲选拍板决定的。

从杭州到上海、江苏、山东……他题写的招牌曾遍布

【文化人物】西泠印社中的『临沂三老』

大江南北。在杭州，郭仲选所题招牌中最有名的一块，要数灵隐飞来峰景区，在景区入口处背面门后的一块匾额上，他题写“灵隐飞来峰”，这块招牌留存至今。友人在回忆中还透露，郭老为人宽厚仁慈，不计私利。当时他名满杭城，杭州百姓中不学书法的也知道郭仲选的大名，面对请他题字或求取墨宝者，郭仲选不顾自己劳累，一概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一一登记在册。当各地遭受自然灾害时，他还组织同事并将自己的作品义卖救灾。《美术报》在郭老去世后撰文评价，“郭仲选对浙江书法界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一种精神层面，他是浙江的一个‘书法符号’，郭老的存在，其实做了一个把书法大众化到普通百姓接受的民间运动，他面向社会、面向群众的书法价值定位，使书法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可能。”

第三老，便是孙晓泉。孙晓泉(1919—2015)，临沂郯城县人，曾读私塾、中学，爱好文学、书法。抗战时期参加革命，1949年参加渡江战役来到杭州，从此在这座江南名城终其一生。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杭州首任文化局长兼党委书记，曾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西泠印社曾两停两次重启，第一次是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后，印社于1963年恢复活动；第二次是经历“文革”之后，印社于1979年恢复活动。由于两次恢复之时，都是孙晓泉任杭州市文化局局长，两次复社之事，其实全由他牵头。

1959年西泠印社拟恢复活动，省里将管辖权下放至市文化局。孙晓泉认为，光有西泠印社一个名称，没有坚实的文物收藏、没有学术交流等是不行的，孙晓泉先生专门指派杭州书画社王树勋主任和韩登安先生去上海动员西泠印社老社员张鲁庵的家属捐献印谱印章，后又收购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赵之谦、虚谷、八大山人等一大批珍贵字画，成为西泠印社重要社藏基础。1978年伊始，孙晓泉以全部身心投入到印社第二次的恢复工作中，仅用两年时间，就全面铺开了诗、书、印、画的工作。其中，他邀请到两位大师沙孟海、启功担任西泠印社社长一事被传为佳话。

2015年11月，随着孙老的辞世，“临沂三老”遂成绝响。